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 湖南教育史

第二卷 (1840—1949)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周秋光 莫志斌



周玉良主持

岳麓书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G527.64

F525.1

:2

# 湖南教育史

第二卷 (1840—1949)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周秋光 莫志斌

# 导 言

---

## 一

本卷论述的是 1840—1949 年湖南传统教育的转型以及湖南近代教育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近代教育从何时发端？1840 年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的标志。此后 20 多年内京师和沿海省份相继举办了一些近代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等。而湖南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使得它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的 50 年内，仍然深闭固拒，拒绝学习西方，与沿海省份相比较，它在近代化实质性的起步上至少晚了 30 多年。

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考察近代教育的发端，应与考察近代文化的发端联系起来。而考察近代文化的发端，我们依照的标准应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全部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运用这个标准审视湖南文化，就会发现湖南近代文化的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来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从 1860 年开始，只要湖南有传教

士涉足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在甲午战前,湖南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sup>①</sup>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两例:一是湘省内河行轮。早在 1866 年,湘阴人郭嵩焘就上书总理衙门,主张仿西方技艺,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 年郭出使英国卸任归里,即筹资创议行轮于湘、鄂间。没想到此举竟遭到了湖南人的极力反对,说是一旦开通了湘、鄂间的行轮,不仅会招引洋人大批地进入内地,而且那些依靠民船运输为业的江河船户,也会因之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垂成。直到甲午战后,其他一些海河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sup>②</sup> 二是 1872 年 6 月,曾国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以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湖南显宦,湖南人尚且如此对待,可见其守旧观念到了何等程度。这种观念和气氛,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 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竖电杆,澧州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反对,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sup>③</sup> 故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熏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sup>④</sup>

①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6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八,中国书店 1990 年版,第四册,第 848 页。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 页。

④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9 页。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设施,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反映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并由湖南人创立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虽然有资料提到在1866年有天主教会在湖南境内设有书院一所,受业人数35人。<sup>①</sup>但尚无资料证明该书院开办的具体情况与教学内容,因此也不能断定该书院就是在湖南所出现的最早的近代教育。依据湖南当时的具体情况,这种外国人办的书院要在湖南推广新式教育是不大可能的。当时任何新式的教育,只要有悖于中国传统,就无

① 《1866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教会新报》1868年第3期。

法在湖南推行,更何况是外国人办的!教育如此,自然也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就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都大力倡办过洋务。诚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但是他们先进的思想和言行,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确甚少,故也就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南文化结构并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甲午战前湖南有了这几位开风气的先人,便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硬要将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强拉入近代化的轨道。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而从属于湖南文化的湖南教育,也仍然还是传统的教育模式。真正的湖南近代教育,是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的。

## 二

湖南近代教育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甲午战争给湖南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心理失衡是一切变化的动因。其中以浏阳人谭嗣同体会最深。谭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湖南人普遍具有的心理落差:“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sup>①</sup>谭说的这种“气馁”并非是在遭受挫折之后一蹶不振,而是放下虚骄的心态去冷静思考,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和措施。谭嗣同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办法和措施。1895年,他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

<sup>①</sup>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sup>①</sup> 谭嗣同的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就是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维新。而学习西方与变法维新,必须先从改革教育入手。

当时湖南无论是主政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还是本籍的士绅欧阳中鹄、熊希龄、蒋德钧、唐才常、皮锡瑞等,都与谭嗣同一样形成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并产生出动力,才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在甲午战后迅速兴起,才使得湖南的新政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湖南近代教育的发轫是先有江标提倡新学,继有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浏阳算学社,湘乡士绅许时遂等人创办东山精舍,再有熊希龄、蒋德钧等人创立湖南时务学堂,陈宝箴改求是书院为武备学堂,王先谦变更岳麓书院课章,全省各地的士绅在本邑或建立新式学堂,或变更书院课章,或在书院旧课外增设新式学科等等。于是从 1897 年下半年到 1898 年上半年,湖南省内便出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以创办近代新式教育为内容的兴学热潮。这场兴学热潮与湖南新政运动相伴而行,其结果是湖南教育的改革不但推动了湖南新政的进展,而且在整个新政运动期间,教育改革也成为湖南新政中成绩最为显著的一项。然而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湖南新政受挫,刚刚发轫的湖南近代教育也一度停顿下来。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随即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继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被迫调整施政方针,于 1901 年宣布实行“新政”,从而使得近代教育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也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得以恢复和重新起步。其时,管学大臣

<sup>①</sup>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 168 页。

长沙人张百熙在北京主持制订了《钦定学堂章程》，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学制上为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央大规模的改书院为学堂的政令发布，以及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一时间，湖南再度出现了兴学热潮，同时还出现了留学热潮。

兴学的首要条件在于师资。为了解决办学中师资紧缺的难题，湖南抚院采取了多种办法和措施。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和分中、西、南三路办理师范学堂，从而形成了湖南自己的教育格局，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学制有了，师资的问题也解决了，于是面向全社会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提上日程。截至1909年止，湖南全省有中学47所，仅次于四川，位居全国第二。这些中学分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办理等多种形式，其中私立中学办得最好和最有特色的是明德、周南等学堂，不仅在省内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也很有名。小学教育起初未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的师资条件一下于还跟不上来，曾经作为权宜之计，采取过办半日学堂即半工半读的办法。到了1905年，省府当局认识到长此以往，对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不少有识之士也指出小学教育乃造端之本与开化之基，不多建小学堂，则升选无资，根基不立，教育也就无法普及。于是省学务处在1905年后采取了积极措施，主要是从各官、私学堂师范班获有文凭的毕业生中选取学有根底的人士充当教习，在全省各县普遍设立小学堂，使得小学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到1909年，湖南已有初、高等小学堂共1113所，学生43310人。

湖南的高等教育是从书院改学堂开始的，以1902年将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为其标志。随后，湖南先后开办数所高等学堂，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医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湖南公立政法学堂等。

湖南在清末所办理的各级各类教育中以实业教育最为突出。

此外幼儿教育、识字教育、学会活动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1912年民国成立,在新旧政体嬗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教育需要,湖南的教育体制在前清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建立了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管理、教员检定、师资队伍整顿和建设的规章、条例与细则,重新确立和完善了各项教育制度。民初,湖南各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最大改进就是将前清读经讲经的课程取消,代之以国文,向学生传授的不再是封建性的忠君、尊孔等思想,而是共和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教育内容里还特别重视美感教育、实利教育等,从而摒弃了封建糟粕,融入了民主、科学的内涵,使之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新的教育宗旨和方针的指导下,湖南的各项教育在民国初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专门学校尤其是专门职业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多。中等教育方面,在学制、学科建设上都进行了改革,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初等教育在民初的几年里,由于省署和各方人士的积极推动,发展较快,学校数目与在校学生人数均大量增加,在全国一直位居前列。幼儿教育方面,则显得不尽人意。大多数幼稚园主要设在城市,广大农村付之阙如。幼儿教师也相当匮乏。留学教育方面,1915年前尚在全国较为突出,不仅留学人数多,而且在省内涵盖的生源地域也颇广泛。社会教育方面,在民初的几年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讲演团、讲演传习所、半日学校、新式图书馆等均次第开办,对开通风气、传递信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湖南教育从甲午战后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为挽救国运,振兴中华,湖南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有识之士苦苦求索,积极宣传和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主张。其中以军国民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为代表,它们相互

激荡,汇合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在晚清,军国民教育、实业教育、国民教育等思想主张只是停留在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受惠的人数并不多,鼓吹倡导者也主要是从事宣传推广的工作,很少有条件付诸实践。民国肇兴,社会环境有很大改善,这些思想也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影响范围日渐扩大,于是思想的潮流便开始形成。除了军国民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潮、国民教育思潮外,后来于五四时期在湖南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的还有工读主义思潮、留法勤工俭学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等等。

在上述教育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许多社团组织和报刊杂志是其承载和传播的工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南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省教育会、湖南少年义勇团总会等社会团体在改良教育环境、革新社会风气中积极活动,对推广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贡献甚多。《湘报》、《游学译编》、《湖南教育杂志》、《大公报》、《实业杂志》等报章杂志经常刊登反映新的教育思想的文章,报道教育革新的相关消息。正是通过这些媒体,新的教育思潮才有可能在三湘大地上流布、涌动。

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对教育政策、教育思想等的变化感受和反应最为直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地相继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新的教育思想迅速推广,国际国内环境瞬息万变。在这种环境中“学生”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式的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喜好变革创新,心怀天下,对时局及关系生存之事常以特殊方式加以表达,不时掀起风潮和运动,这既反映了年轻学生的叛逆性情和躁动不安的心态,又是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萌生的体现。在清末民初,湖南学界风潮和运动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的民意社情和群众心理,也对时局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三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教育领域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其时封建与民主,迷信与科学,读经与反读经的斗争达到高潮。各种教育团体,教育刊物的风行与新式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理论的传播与实践,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蔚然成风,加之交通邮电事业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也构成了有利于文化教育发展的社会条件,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湖南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

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大好局面。杨昌济、徐特立与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行动都别具一格。其他一批教育名人与名校的涌现,如陈润霖之于楚怡,易培基之于一师,胡元倓之于明德,朱剑凡之于周南,曾宝荪之于艺芳,何炳麟之于岳云,罗辑重之于陶龛,使得湖南教育界呈献出一片星光灿烂、光彩夺目的新气象。

在1927年到1936年国共两党内战时期,由于主持湘政的何键对孔教顶礼膜拜,鼓吹固有道德,力倡尊孔读经,实施“特种教育”,进行反共宣传,致使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又一度沉渣泛起,湖南教育界滋生出一种不问现实政治,只谈经学古文的复古风气。为了反对军阀对教育的压抑,打破复古沉闷的气氛,湖南教育界师生奋起抗争,发动了争取教育复兴与教育经费独立等一系列民主运动。尔后,随着国民政府在湖南经济地位的稳固,逐步增加了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1932年6月朱经农以教育专家的身份任湖南教育厅长,他努力推行民主教育思想,加紧与何键等省府头面人物联系,争取政府多方支持,并从减少失学儿童人数、均衡学校布局、改善教育质量等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致使湖南教育又出现了兴盛发展的局面。在初等教育方面,至1937

年抗战前夕,湖南各类小学已达 23800 余所,学生 103.3407 万人,教职工 48247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接近 30%,为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中等教育方面,1934 年全省有普通中学 83 所,其中私立 51 所。从 1932 至 1937 年,全省共举办中学毕业会考 11 届,参加学生达 27783 人,及格者 21106 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1938 年“文夕大火”前,湖南共有高、初级职业学校 51 所,属高级的 18 所,初级的 33 所。其时全国共有职业学校 256 所,湖南占 1/5,全国有职校学生 31897 人,湖南有 5031 人,占 1/6。<sup>①</sup> 中等师范教育,湖南按省教育厅规定,达到了每县都设立一所师范院校的目标。在高等教育方面,与全国相比较,湖南高校的数量较少,据 1932 年的统计,湖南在全国排名第 11 位,学生人数每百万人口专科以上学生 11250 人,全国排名第 14 位。<sup>②</sup> 偌大的湖南省高等学校仅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以及私立的群治农商学院共 3 所,学生总数 592 人。但是在质量上,湖南的高等教育还是有地位的。如湖南大学经过 10 年的扩充整理,进入了国立大学的行列。湘雅医学院受到国内外医学教育界的关注,成为与协和齐名的高等学府。在社会教育方面,省当局加大了对原有中山图书馆改善与扩充的力度,并又督促各县设立图书馆。据 1930 年 1 月统计,湖南全省 77 县,除会同、大庸两县外,都建立了县级图书馆。与图书馆同时引人注目是民众学校与识字运动的蓬勃兴起。据载,至 1934 年,湖南全省有民众学校达 3600 余所,1936 年再增至 5000 余所。此外,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边界各苏区开展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呈献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 1937 年到 1945 年抗战时期,虽然日寇铁蹄已蹂躏大片中国国土,但湖南相对于东北、华北、华东等地而言,局势较显平和。

① 《湖南教育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上册,第 506 页。

②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民国二十三年编,J 编,第 2 页。

加上华北与沿海等地的大中学校南迁西移来湘办学,特别是湖南教育界师生艰苦卓绝的奋斗,且有像张治中这样的地方行政长官实行救国的战时教育政策,以及一些地方官吏对教育的扶持,湖南教育与其他省份相比不但没有衰退,相反还一度得到发展。在某些方面,如中学教育,还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小学教育、师范教育也获得相当的进步。

抗战后期,日寇为打通南下太平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多次侵湘战争,使湖南大片土地沦陷,教育亦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据1945年调查统计,湖南教育文化损失,总数高达897.2亿元。其中中学(包括省、县、市、私立)占540余亿元。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文化机关占350余亿。40年来的教育建设,几乎全部毁灭。而对如此严重的损失,湖南教育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教育事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推行专制和内战政策,湖南的教育事业在逐渐恢复的同时又出现严重的危机。内战爆发后经济萎缩,物价飞涨,使恢复和发展教育的许多措施无法实现,师生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学校特务横行,法西斯教育加强。在此形势下,教育界纷纷起来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直到湖南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教育事业才真正走向新生,走上健康和繁荣的发展之路。

#### 四

综览湖南近代教育产生、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脉络,通过对其内容与形式的分析透视,发现它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湖南近代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十分迅速。鸦片战争发生后20年,以洋务运动为背景,沿海省份率先步入近代化进程。此后内地各省紧随其后,改革传统教育,设立新式学堂。可是湖南却迟至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而起步才几年,就因戊戌政变的发

生受挫停顿,直到清末新政时才又重新起步。然而起步虽晚的湖南近代教育却并未因此落在国内其他各省的后面,相反以其快速发展的步伐,甚至还超过国内其他一些省份。例如中学教育,居然仅次于四川,在全国排名第二。1908年,《湖南教育官报》载文称:“查湘省僻在一隅,风气开通较晚。自奉明诏兴学,省城及各州县概设学堂;及奉旨停止科举,而官私各校日新月异,新学出洋踵趾相接,土风丕变,见闻日增。三五年来,省城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及中小学堂、实业高等学堂肄业者,不下数千人。即游学预科之科,三路师范之设,莫不次第成立,粗具规模,而各属响风承流,校舍林立,遍于乡市。向之风气迟开者,今之进化亦较速特。”<sup>①</sup>

二是湖南近代教育在其发展中异彩纷呈,类型各别,形式多样,但又偏轻偏重,极不平衡。所谓类型各别与形式多样,是说湖南近代教育有官立、公立、私立与外国教会办理等多种形式,也有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各种类型。但是这些形式多样与类型各别的教育,明显地存在着偏轻偏重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具体地说,在多种形式的办学中,从学校的数量说,是官立与公立的为多,但从办学的质量与效果说,是官立不如公立,而公立又不如私立。私立中又以教会办的最有特色,为许多学子所向往。在各种类型的教育中,特别受重视的是师范教育与中学教育,特别突出的是女子教育和留学教育。实业教育是各种专门教育中最为突出的,而普通教育中的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专门教育中除实业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种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等,相比之下却十分逊色,有的甚至还遭到冷落。

三是湖南近代教育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仍在湖南士子身上发挥作用。湖南近代的第一所

---

① 《升任闽督部堂张札提学司整顿湖南学堂文》,《湖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

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在它的学约中公开声称：“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矣。”它要求学生中学与西学并重，“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而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志。<sup>①</sup>可见，时务学堂的创办者们意在将时务学堂的学子们都培养成为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干才。实际效果也是如此，时务学堂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学生中，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就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风云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十余人。毛泽东在他早年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称：“时务以短促的生命，却养成了若干有为的青年。”<sup>②</sup>时务学堂之后，湖南教育界的诸多有识之士，仍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他们不主张学生读死书，或只学习专门的文化知识，而是要求学生关心国事，投身救国的革命洪流与风潮中去。故从晚清到民国的湖南众多的新式学校也就成为各种新思想与新思潮流布的场地，也成为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战场。如胡元倓创办的明德学堂，曾经成为华兴会的策源地。禹之谟创办的工艺学堂、唯一学堂（后改为广益学堂），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斗争中成为主力。还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创立“新民学会”，发动驱张运动，领导湖南的新文化运动，等等。总之，从晚清到民国，湖南教育界学运不断，风潮迭起，可以说是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与“学与政兼”的政治参与意识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与反映。

四是湖南近代教育中也体现了一种湘人对于新式教育的不断探索与创新精神。湖南近代教育起步虽晚，但湘人对于新式教育

①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8页。

②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的探索却与全国其他各省同步甚至领先。甲午战前,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湖南之外即有过对于新式教育探索的贡献;甲午战后,湖南维新派谭嗣同、熊希龄、蒋德钧等人率先在湖南进行了新式学堂创建的尝试。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主持制订清政府第一个学校系统文件,又称“壬寅学制”的是湖南长沙人张百熙。后来湖南的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在湖南创办各类新式教育,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实践,走出了发展和振兴湖南教育的新路径,形成了湖南自己所特有的教育规模与格局。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即1915年4月,湖南省教育会提出了一项《改革学校系统案》,被称为“湘案”。该案赞同初等教育分流,认为“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之目的不同,其方法与组织应有区别”。它与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在初等教育分流的外观上虽一致,但立意却有分歧。它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切实地推行义务教育,以提高全体国民的普遍素质;如何尽力发展人才教育,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该案提出后,在191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大会上,受到高度重视。该会决定以三个月为期,请各省教育会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故“湘案”可以说成为新学制讨论的嚆矢。<sup>①</sup>

民国时期,对于湘人办教育的精神与勇气有人进行过赞扬与总结,爰摘引如下:

自清末以至于今日,湖南尚有一种坚贞永毅之精神,始终与革命运动相辅以行,此即湖南教育界之精神。四十年间,如胡元倬之于明德中学,陈凤荒之于楚怡工校,彭国钧之于修业农校,曹籽谷之于文艺中学,易培基、谢祖光、熊梦飞之于第一师范,何炳麟之于岳云中学,劳启祥之于雅礼中学,方小川之

①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于妙高峰中学,张星舫之于祖庵中学,鲁立刚之于长郡中学,彭锦云之于兑泽中学,朱剑凡、李士元之于周南女校,曹绍春之于明宪女校,宾步程之于高工,成希文之于一职,周方之于民范枫林,郭干于之于行素中学,以及教育行政方面之余先砺、周调阳、夏开权等,皆以母鸡孵蛋之精神,维护学校,培育后进,不入仕途,不竞名利,数十年如一日,匪独教学,抑且领导社会,反专制、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相蔚成风,始终作动荡中的中流砥柱,此为湖南教育界特有之光荣传统,弥足珍贵者。<sup>①</sup>

## 五

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在繁荣自己的同时,也丰富和繁荣了文化的内涵。近代湖南教育与近代湖南文化的关系正是这样。要言之,湖南近代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为湖南和中国培养了大批经国济世的人才。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大体上先后产生了五大人才群体。如果将湖南近代教育的开端定位在甲午战后,那么在甲午战后由湖南近代教育熏陶培育起来的人才群体至少有两个:一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即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出现的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熊希龄、谭延闿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中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革命志士和立宪派人士,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梁戡时、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翼,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

<sup>①</sup> 刘恪如《湖南精神》,《社会评论》1937年2月16日,第60期。